

# 清代中期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川 培养华籍神职人员活动述评

郭丽娜 刘文立 朱清萍

**提 要：**清代中期，巴黎外方传教会根据罗马教廷的指示，在四川落实神职人员本土化策略。传教会依据既定的原则，注重在幼童中物色合适的神父人选，强调拉丁文学习的重要性，同时允许存在用中文做礼拜的过渡时期，通过以外派留学为主和以自办修院为主两个阶段选拔和培养华籍神职人员，并为他们的传教活动提供经费资助。

郭丽娜，女，广东人，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刘文立，湖南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清萍，女，江苏人，中山大学大学外语教学中心讲师。

**主题词：**清代中期 巴黎外方传教会 四川 神职人员 本土化

中国礼仪之争尘埃落定后，清政府厉行禁教。受禁教政令影响，北京和江南天主教区呈现萎缩状态，教徒锐减。而有关史料显示，1750年至1800年间，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统传教领地四川，天主教会不仅没有出现没落趋势，反而蓬勃发展，期间当地教徒人数增长了十倍，四川代牧区还兼并了贵州和云南两个教区。关于天主教之所以能在川展现生机，学者罗伯特·安特蒙认为存在边区环境、地方政府的疏忽和中国籍领导人的参与等诸多有利因素，他特别指出“中国籍神职人员、平信徒和修女对天主教在中国发展成一个大众化的宗教贡献极大。”<sup>①</sup>安特蒙的观点基本上得到国内教会史研究界的认同，西南民族大学研究员秦和平曾指出“加大对国籍神职人员的培养力度，将其推向传教的前台”<sup>②</sup>是清代中叶天主教在川的重要传教方式之一。但至于巴黎外方传教会究竟落实神职人员本土化策略，其具体培养方式和内容如何等问题，由于内地缺失相应的教会史料，所以学界也就了解不多。鉴于此，本文主要依据巴黎外方传教会保存的相关资料 and 档案，剖析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川积极执行神职人员本土化策略的原因，阐述其选拔和培养原则及其具体培养方式，希望有助于国内教会史研究界更清晰地了解清代天主教在川的活动情况。

## 一、神职人员本土化的原因

十八世纪初，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川传教，反复强调要“建立修院和祝圣当地司铎，付洗大量的异教徒孩童，派贞女教导女童。”<sup>③</sup>巴黎外方传教会之所以积极推行神职人员本土化计划，究其原因，除了是落实罗马的远东传教思维外，还在于传教会意识到本土神职人员在禁教时期对于四川教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据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清政府禁教后能顺利入川传教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士为数不多。1753年1月8日，罗马正式将四川划归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经马青山（de Martillat）力荐，传教会驻澳门账房梅若望（J. B. Maigrot）被任命为四川代牧，不过他早已于1752年10月20日在澳门病逝<sup>④</sup>。1753年9月18日，教廷又任命传教会驻澳门新帐房拉塞尔（Pierre-Antoine-Etienne Lacerre）为四川代牧兼云南教务管理，祝圣为塞拉主教（évêque de Zéla）。1754年，拉塞尔接到通谕，考虑到环境险恶，犹豫再三，最后拒绝受命<sup>⑤</sup>。1756年2月12日，教廷继而任命在广东传教的赖孟德（Claude-François Raymond）为四川代牧。赖孟德接到通谕时，因病重已转到澳门休养。1756年11月，他指定傅方济（François Pottier）为四川助理主教，不久就

在澳门辞世<sup>⑥</sup>。1756年傅方济入川，以助理主教身份管理教务，1767年1月24日被任命为四川代牧，祝圣为阿嘎多波里主教（*évêque d'Agathopolis*）<sup>⑦</sup>。至此，法国遣使会主教穆天尺（*Mullener*）辞世二十五年后，四川代牧区才有了正式的教务管理者。

至于普通传教士，据传教会统计，1619至1815年间，成功抵川的仅有28人<sup>⑧</sup>，有的入川后水土不服，传教时间不长，有的因故被遣回，对教务的发展作用不大。如达尔提格（*Jacques D'Artigues*）1740年3月23日到达成都，因感染风土病1744年10月10日在成都病逝<sup>⑨</sup>；费布仁（*Urbain Lefèbre*）1754年3月23日到达重庆，尚未开展工作就在6月29日入狱，1755年初被遣回澳门<sup>⑩</sup>；潘旭（*Pierre-Antoine Pansut*）1777年11月24日从巴黎启程往四川，1779年6月25日在成都去世<sup>⑪</sup>；普杜伊克（*Boutouillie-Villegonan*）1793年达到四川，不久感染肺病，1794年5月1日在崇庆州病逝<sup>⑫</sup>；吴神父（*Etienne Devaut*，中文文献中的胡斯得旺、额地咦德窝）1783（或1784）年入川<sup>⑬</sup>，戴尔朋（*Joseph Delpon*，中文文献中的彭得而朋、吧地哩味洒、吧地哩哑度）1784年入川管理江油教务<sup>⑭</sup>，1785年乾隆朝教案，两名传教士入狱，先后在7月3日和8日卒于北京刑部大狱。那些能够长期留川的传教士，亦由于语言不通和外貌特征的明显差异，难以正常开展传教工作。傅方济曾致信总会云：“并非异教徒阻止我们进行巡视，而是基督教徒本身拒绝我们将福祉带给他们。他们无可救药的怯弱使他们找出千百个理由来让你知难而退，‘不幸的是，你们是欧洲人，你们罔顾帝国的法律来这里，会使全部的基督徒遭殃的’。”<sup>⑮</sup>

相反，本土神职人员不仅可以利用体貌和语言等客观优势在禁教期间隐蔽传教，而且他们了解当地民俗，能接近民众，在讲解教理时对症下药，有效地减少抵制和反对因素，使教徒产生认同意识和接受愿望，从而更有效地吸收新教徒，保证教会存活并加速其发展。因此，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川后，旋制定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培养计划，从培养目标、人员选拔、修院建设和经费资助等各方面扶持本土神职人员的成长。

## 二、华籍神职人员的选拔和培养原则

为了保证华籍神职人员的质量，巴黎外方传

教会在人员的选拔和培养上秉承如下原则。

（一）选拔原则：重视幼童的宗教信仰培养，在幼童中物色合适的培养对象。

关于培养华籍神职人员，教廷其实早就有所指示。不过对于如何招募人员，最先入华的耶稣会内部存有争议。澳门的葡籍会士认为“中国人道德败坏，无法胜任福音工作；只有挑选中国幼童，让他们从小就不接触其同胞，甚至是澳门同胞，再加以教导，才有成功的机会”，而且幼童更适合学习拉丁语<sup>⑯</sup>。但是在北京宫廷供职的法国耶稣会却认为中国已有成年人皈依天主教，并表现出传播福音的热忱，毋庸置疑，应该为他们授神品，才合乎常理。法国耶稣会还提议“用中文做宗教礼拜，这样有利于在皈依圣教的中国文人中选择有德行者，授予圣品，而无需强迫他们学习拉丁文”<sup>⑰</sup>。

对于耶稣会内部的两种意见，巴黎外方传教会倾向于支持前者，因为传教会认定法国耶稣会所说的“有德行者”是指中国统治阶层中的信教者，这与传教会一贯主张的下层传教路线向左。四川传教士梁弘仁（*de la Baluère*）上书教廷称：“没有比选取幼童，严格地按照教规引导他们，培养他们对信仰的虔诚，更能使中国福音事业有所收获。我们可以从他们当中挑选和培养一些灵牧，让中国更好地倾听到主的声音和更自由地遵循主的准则。每次想起这一意图，我都确信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证实不懈地在中国培养出一个教士阶层的适当性和必要性。”<sup>⑱</sup>

在传信部驻澳门账房的提议下，1735年教廷拨出一笔定期固定专款，作为幼童付洗工作的津贴<sup>⑲</sup>。1767年，巴黎外方传教会驻澳门账房罗曼（*Romain*）通过总会，呼吁法国教徒捐款，“以赎买和培养中国孩童”<sup>⑳</sup>。1769年，四川代牧傅方济从传教经费中拨出100皮阿斯特（*piastre*），作为付洗幼童的专款，并指定两名传教士负责这项工作。他在写给吕齐尼昂公爵夫人（*Comtesse de Lusignan*）的信中说：“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派人到处寻找和付洗偶像崇拜者的垂死孩童，联系那些想把孩子献给我们的人和那些受洗后仍活着的儿童。”<sup>㉑</sup>据傅方济统计，1700年四川受洗儿童有68人，1771年77人，1773年71人，1775年454人，1778年达到1015人，1779年猛增至30000人<sup>㉒</sup>。受洗儿童人数的增加为选拔合适的神父提供了可能。

(二) 培养原则: 循序渐进, 允许存在用中文做礼拜的过渡时期, 强调拉丁文学习的重要性, 不断提高华籍神父的素质。

对于华籍神父是否必须学习拉丁文, 可否用中文做礼拜, 教廷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1615年3月26日, 教宗保禄五世(Paul V)曾授意传教士将《圣经》译成中文, 意在允许未来的华籍神父用中文做礼拜和管理圣事, 但是通谕最终没有发出, 其文本存于罗马档案室。1660年, 情况发生变化, 传信部领导红衣主教巴尔贝里尼(Barberini)致信各地宗座代牧, 声明“由于事件严重及其不可预知的后果, 在清楚、准确地弄清这些地区的宗教状况之前, 圣部不对如此重要的事情做出定论,” 指示宗座代牧的“首要责任是向说汉语的当地司铎传授拉丁文”<sup>⑤</sup>。9月7日, 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re VII)召开主教会议, 解决教派分裂问题, 会上讨论了是否允许使用各地语言做礼拜一事。最后各主教以防止教派分裂为由, 通过拉丁文是做礼拜的唯一语言的决议<sup>⑥</sup>。这间接地否定了使用中文做宗教礼仪。

事隔二十年, 时任耶稣会中国教区会长的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基于传教的需要, 尝试重新引入用中文做礼拜一事。1681年, 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到达罗马, 请求确认保禄五世的通谕。1695年8月15日, 北京的耶稣会士向罗马提交备忘录, 请求放宽对华籍神父的拉丁文要求, 允许用中文做礼拜。备忘录称, “教会建立初期, 弥撒是用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庆祝的。在某些不通行这些语言的地区, 教宗特许使用当地语言。882年, 若望八世(Jean VIII)同意在莫拉维(Moravie)地区用斯拉夫语做弥撒。如果在莫拉维可以这么做, 那为什么在中国就不能呢?” 备忘录指出语言的差异不是教派分裂的根本原因, 异端的邪恶才是教会分裂的主要根源。至于“如果中国神父不懂拉丁文, 如何跟罗马沟通”的问题, 耶稣会士建议“只需象建立马龙文(maronite)修院一样, 在罗马成立一中文神修院。修生们可充当翻译”<sup>⑦</sup>。

关于这一问题,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看法是必须学习拉丁文, 但是在神职人员培养初期, 为追求传教人手的迅速增长, 须存在一个用中文做礼拜的过渡时期。陆方济(Pallu)入华后, 就请求罗马红衣主教们“免除(中国)当地主教学习

拉丁语之苦。期待在数年中会有相当一批受过拉丁语训练的人, 其中也不会缺少适宜取代第一批主教的对象”<sup>⑧</sup>。1702年, 白日升(Basset)在成都上呈一篇题为“中国传教之我见”的报告, 也指出了在短期内用中文做礼拜的必要性: “经过如此多的曲折, 挽救四川天主教会的办法只有一个, 就是用中文翻译圣经, 并准许用中文做礼拜……这是唯一可以让中国人熟悉并乐于接受基督信息的方法”, “如果圣部同意上述建议, 如果中国给与我们十年的和平, 如果主派出足够的灵牧, 那么可指望在这段时期内出现不少于20名受过良好神职教育、可以身为楷模的司铎, 不少于30名可以进行教理宣传的传道员, 并相应地会出现一大批了解和恪守其受洗义务的基督徒”<sup>⑨</sup>。基于这样的认识, 十八世纪上半叶, 四川传教士除了向华籍修生传授拉丁文外, 也将部分神学和教理书籍译成中文。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 尽管巴黎外方传教总会仍有意在拉丁文问题上做出让步, 但当时负责四川教务的华籍神父李安德根据自身经验, 坚持要修生学习拉丁文, 他将拉丁文教学作为“其教士培养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基础部分”<sup>⑩</sup>。李安德认为, 华籍神父通晓拉丁文有助于改变华籍神父与外国传教士的不平等关系; 另外, 拉丁文是教会的通用语言, 华籍神父通晓拉丁文能更准确地理解基督教义, 更好地领会教廷的旨意和提高自身的宗教修养。他致信赖孟德说: “上了年纪的司铎根据长期经验, 都知道中国人即使受过教育, 也会被欧洲人所歧视……那我们的教士怎么能没有文化呢?” “一位对拉丁文一无所知的华籍司铎怎能探求基督真理的源泉? 圣经、使徒书信、长上的书函和教会的决议, 无不使用拉丁文”, “尤其是我们这里, 教难时有, 司铎往往需要独处, 甚至孑然一身, 远离主教, 长年与欧洲司铎失去联系, 无法向他们求教”<sup>⑪</sup>。

1788年, 巴黎外方传教会负责人德斯库尔维耶(Descourvières)就中文做礼拜一事咨询傅方济的意见。傅方济明确表态“我一直认为没有必要再遵循用当地语言做礼拜这一老路子”<sup>⑫</sup>。1779年10月6日, 他在写给李神父(Georges Alary)的信中说: “我认为以中国人难以忍受学习拉丁文的困难为借口而提出用当地语言来做宗教仪式是既没必要的, 也是无益的。”<sup>⑬</sup> 1798年8月9日, 四川主教冯若望致函总会, 说“这种让

步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中国人能够学习拉丁文,因为不懂拉丁文的司铎比其他人更容易多犯错误;而这种让步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很难准确地翻译弥撒常规经和宗教礼仪,也因为这种翻译难以让中国人理解”<sup>⑧</sup>。由此可见,十八世纪下半叶,随着四川传教人手紧迫的状况有所改善,四川教会在神父培养上遂转向强调质的提高,而非量的增长,用中文做礼拜一事已不为传教士所提倡。

### 三、华籍神职人员的培养

清代中期,四川天主教区华籍神职人员的培养工作基本上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白日升至李安德时期,以外派留学为主来培养本土神父;第二个阶段始于代牧傅方济任内,教区开始通过以自办修院为主的方式来培养神父。

#### (一) 以外派留学为主的阶段

十八世纪上半叶,四川尚未有正式的教会修院,本土神父的培养基本上走如下程序:先由传教士在实践中对修生进行言传身教,让他们耳濡目染,体验传教生活,然后再选择优秀者推荐到暹罗圣若瑟修院或巴黎神学院进修。这一阶段包括白日升和梁弘仁(de la Baluère)的实践摸索时期(1702—1715)、马青山的艰难发展时期(1742—1746)和李安德的向自办修院过渡时期(1746—1767)。

白日升和梁弘仁进入四川后,便招收李安德、苏宏孝和党怀仁为弟子。由于缺乏经验,两人在教学上并无定法,有时甚至出现意见分歧。白日升比较重视实践活动,认为神父应具有良好的体魄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才能适应艰苦的传教工作,所以常要求三名修生从事体力劳动。而梁弘仁注重理论学习,故常抱怨“本堂神父先生不时支使孩子们干这样那样的杂活。他们是圣器管理员、园艺工、马夫、厨房小学徒、仆人的仆人……他们甚至一连几天都没有看书。”<sup>⑨</sup>1707年,李安德等人跟随白日升和梁弘仁去澳门,1709年12月21日,铎罗在澳门为李安德和党怀仁举行教士剃发礼。1716年,李安德等人获云南代牧卜于善(Le Blanc)推荐,到达暹罗圣若瑟修院,接受正规的拉丁文、哲学、神学、人类学和远东语言教育。这使他们在道德和宗教修养上获得极大的提高,李安德后来成为四川天主教传教史上最有名的华籍神父。

马青山代理四川教务初期,当地有4名华籍神父,分别是李安德、党怀仁和传信部派遣的苏洪学(Paulus Sou, 1692年生于广东,1770年卒于澳门)、谷若翰(Joan-Baptiste, 1701年生于北京,1763年卒于北京)。由于四川地域广阔,传教人员仍远远不足,1745年5月6日,党怀仁去世,人手更显短缺,限制教务发展,因此马青山也非常重视招募修生,传授教理,外派留学。1740年,他致信巴黎神学院,称如果能为他提供足够的资金,即每年每人50两,就足以寻找和教导10至20名修生<sup>⑩</sup>。不过当时禁教风声颇紧,培养工作相当艰难。

根据马青山的日记,1734年,他向暹罗修院推荐过两名修生,但两人均因信品不佳而无法完成学业;1737年,他曾计划派遣几名修生到巴黎神学院进修,却因资金短缺而无法成行。1741年,马青山又招募两名修生,其中一名从1734年就已开始跟随传教士学习,当时年仅12岁,有较好的潜质,但不久身患疾疫,在下四乡病逝<sup>⑪</sup>;另一名叫张多默(Thomas Tchan)的修生则品质不端,最后由其父亲领回<sup>⑫</sup>。1742年,马青山再次向暹罗推荐了骆马修(Mathieu Lo)和王若望(Jean Van)<sup>⑬</sup>。为了使教区神职人员数量在短期内有所增加,以适应教务的发展,1744年,马青山甚至请求罗马赋予他与东京和交趾宗座代牧同样的权力,为能读但不能写拉丁文的中国人受神品<sup>⑭</sup>。同年12月23日,他就为张修生(Sylvestre Tchang)举行剃发礼<sup>⑮</sup>。总的来说,马青山时期,修生虽然在人数上有所增加,但多数素质不高,学习情况不尽如人意,所以没有出现较有影响力的华籍神父。

1746年马青山离川后,李安德独自承担教务二十年,并坚持发展教会灵牧。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传教会除了向异教徒传播福音外,还特别接受教宗和传信部的训令,致力于本土神职人员的培养。”<sup>⑯</sup>此外,他还将神职人员培养计划向前推进了一步,尝试在本土自办修院。

早期因为禁教,限制了外派修生留学,李安德就因承其师白日升和梁弘仁的做法,采取“背兜传教”<sup>⑰</sup>的方式流动教学,利用巡视各地教友的机会,帮带徒弟,传授教理和教仪知识。据李安德日记,1748年至1750年间,他招收过以下修生:刘林(Lin Lieou),8岁;李尼古拉(Nicolas Ly)和郝多默(Thomas Hao),12岁,

覃家沟人 (Tchin-kia-keou); 吴达德 (Thaddée Ou)、刘斐理 (Philippe Lieou)、简巴提斯 (Baptiste Ghien) 和简保禄 (Paul Ghien), 年龄介于 10 至 12 岁之间, 彭山人; 吴伯禄 (Pierre Ou), 姚家坝人 (Yao-tse-pa)。1752 年, 李安德又招收了刘保禄 (Paul Lieou), 1753 年, 招收了江方济 (François Tsiang) 和叙定 (Siu-tin) 的赵查理 (Charles Tchao, 20 岁)、郑巴齐 (Basile Theng)。另外, 当时在川传教的另一华籍神父李路加 (Luc Ly) 也努力发展学生, 他的学生有吴安德 (André Ou)、张巴提斯 (J. B. Tchang) 和孙巴提斯 (J. B. Sun) 等人<sup>④</sup>。

不可否认, 手把手的传授方式适应禁教的特殊环境, 有助于修生在实践中学习、掌握和运用所学的知识, 但是这种教学方式也存在弊端, 主要体现为长时期的流动不利于修生接受正规教育, 不利于他们体会教理和进行内心反省, 提高自身修养。因此李安德经过反复思考, 认为不能“因而放宽要求, 培养二流的教士阶层”, “通往圣职的道路不能绕过修院这一关”<sup>⑤</sup>。一旦环境许可, 他仍会努力派遣修生到国外修学。不过路途遥远, 时有不测, 比如严若望 (J-B. Nien, 1738 年生于棉州、1739 年 5 月 26 日领洗) 在 1756 年往暹罗途中就不幸丧身长江<sup>⑥</sup>, 所以李安德决定尝试教会自立, 在本土自办修院, 特别是他晚年时期, 行动不便, 难以到各传教点巡视, 实现这一想法的愿望更加迫切。

1763 年, 李安德离开成都, 在 1757 年 (或 1758) 成都北郊凤凰山教徒刘马克 (Marc Lieou) 捐赠的一处地产上搭建了一简易草房, 起名为“圣诞神学院”<sup>⑦</sup>, 在此教导约 12 名修生学习教会论、拉丁文、历史、地理和中文, 变流动教学为固定授课。虽然这样仍未走出“师傅带徒弟”<sup>⑧</sup>的培养模式, 而且随后由于禁教李安德本人藏身到双檬子 (Chuang-meng-tse) 山区, 他的修生则去了本地治理神学院, 圣诞神学院无法继续经营, 最终在 1765 年宣告关闭, 然而这座小修院“在某种意义上是梁弘仁 (de la Baluère) 之后, 六十年以来四川的首家神修院,”<sup>⑨</sup>它开了四川天主教会尝试自办修院的先河。

## (二) 以自办修院为主的阶段

这一阶段起步于傅方济任内 (主教任期 1767—1793), 在冯若望 (主教任期 1793—1801) 和徐德新 (主教任期 1801—1815) 初期

得到极大的发展, 徐德新主教后期受到清政府的打击, 但在冯达拉时期 (主教任期 1793—1801) 得到恢复, 并进一步发展。

乾隆年间, 禁教政策曾有所松动, 一些巴黎外方传教会士趁机潜入四川, 特别是 1765 年以后, 四川传教士人数有了明显的增加。据传教会档案记载, 郭明益 (Claude Falconet) 1766 年达到四川, 负责成都附近一个有 600 名基督徒的传教点的工作。他在崇庆府附近开辟过几个新传教点, 1772 年 6 月 26 日病逝于成都, 葬于凤凰山公墓<sup>⑩</sup>。李神父 (Georges Alary) 1767 年抵蜀, 负责川东教务, 1769 年被傅方济任命为川东本堂神父, 1772 年被召回欧洲<sup>⑪</sup>。艾若瑟 (Jean Francois Gleyo) 1767 年抵川, 负责江油堂口的教务, 1769 年在永川被捕, 后获钦天监葡籍传教士傅作霖 (Félix da Rocha) 推荐, 参与绘制西南“小西藏”金川的地图, 于 1777 年 7 月获释。随后艾若瑟潜回叙府, 深入云南, 管理龙溪及附近一带的教务, 1786 年 1 月 6 日在龙溪病逝<sup>⑫</sup>。梅神父 (Jean-Martin Moÿe) 1772 年 12 月 30 日入川, 1773 年被任命为川东和贵州的堂神父。传教期间, 他开辟过江津天主教徒社区, 在长寿皈依了几百名成年教徒和开办过一家言经学校, 指导川东贞女传教, 创建四川第一家女校, 1782 年才返回法国<sup>⑬</sup>。1772 年 12 月, 冯若望 (Jean-Didier de Saitn-Martin) 从巴黎启程前往四川, 1783 年被傅方济选为助理主教, 1784 年 6 月 13 日获得祝圣为卡拉德尔主教 (évêque de Caradre), 1801 年 11 月 15 日在崇庆州 (Tsong-king Tcheou) 附近病逝<sup>⑭</sup>。徐德新 (Gabriel-Taurin Dufresse) 1775 年 12 月 4 日从巴黎出发, 1793 年获任川东本堂神父, 1800 年被选为助理主教, 同年 7 月 25 日在成都被祝圣为达布拉卡主教 (évêque de Tabraca)。他在嘉庆朝禁教时被捕, 1815 年 9 月 14 日在成都北门东校场被枭首<sup>⑮</sup>。刘翰墨 (Thomas-Julien-Charles Hamel) 1777 年前往四川, 先在川东与梅神父共事, 1780 年进入云南管理龙溪教务, 1787 (或 1788) 他随龙溪修院迁回四川落壤沟, 1812 年 12 月 13 日在落壤沟去世<sup>⑯</sup>。以上传教士除了个别因故提前回国外, 大部分在川活动时间较长, 甚至后半生都在四川度过。他们的到来不仅大大地增强了四川的传教力量, 而且为教区自办修院提供了人力和师资, 因此四川天主教会开

始进入以自办修院为主来培养本地神职人员的阶段。

1767年傅方济获命为四川代牧。在神职人员培养上，他开始延续了向圣若瑟修院派送修生的做法。据陆南述，1760年，傅方济派出1名修生；1761年2名；1764年4名；1765年2名（韦特 Vite 和保禄 Paul）。1767年，他派出张安德（Andrien Tchang，20岁）和骆玛弟（Mathias Lo，16岁，1785年受铎，方豪写作罗玛弟）；1769年派出文查理（Charles Ouen，20岁）、刘马克（Marc Lieou，17岁）、谢若望（Jean Sie，16岁）和刘若瑟（Joseph Lieou，15岁）；1776年派出甘玛宝（Matthieu Kan）；1778年派出1人；1779年派出3人，分别是唐伯辉（Etienne Tang）的长兄、王若望（Jeachim Ouang）和谢若望（Jeachim Sie）<sup>⑤</sup>。

不过当时印度支那和中南半岛的时局不稳，圣若瑟修院多次迁址，影响到修生的正常修研，加上葡萄牙不时在海上拦截，外派留学始终存在诸多不便。冯若望（Saint-Martin）曾在给总会的信中说“本地治理（当时圣若瑟修院的所在地）的气候不适合中国人，他们在那里既浪费时间又不利身体健康”；傅方济也认为“车马劳顿、本地治理与英国人战争的不确定性、修生在澳门荒废一段时间的学业等等，都是我们派送修生留学的巨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川东梅神父致信傅方济，称“如若将来的某一天，异端分裂中国教会，它将会扬言中国司铎在宗教理论方面不学无术或学识不全，从而取而代之”，提议在川自行创办正规修院，培养合格的初级神职人员<sup>⑥</sup>。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傅方济认为时机成熟，正式启动建设修院计划。结合前期的经验，他认为修道院最好坐落在长江右岸川滇交界的三不管地带，这样既可“提供长期的安宁”，也可在“困难突然而至的时候，由于接近两省边界而使川滇两边传教士便于相互走动往返，躲避两省当局的搜捕。”<sup>⑦</sup>经过考察，地址最终确定为刘翰墨管理的云南大关县龙台乡龙凤场的龙溪。傅方济指示，修院建成后要满足两方面的需要：一、作为前期教育基地，为年轻的修生提供一至两年的基础教育，修生毕业后，通过考核，再择优派往圣若瑟总修院深造；二、作为大神学院，为年长的修生（通常是老传道人）提供进修教理和拉丁文的机会<sup>⑧</sup>。他希望藉此为四川教会培养

出不同层次的神职人员。

1780年，传教士艾若瑟被派往龙溪。他在当地天主教徒唐辉昌（Ten hou-tchang）的协助下，以种植树木和茶叶为名，以唐辉昌的名义购得一块地皮，兴建修院。整个工程最初预算30两银，后因扩建，最终费用追加到“至少700两”<sup>⑨</sup>。

1781年修院落成，刘翰墨成为首任院长。他提出了三条解决途径生源问题：一是向比较虔诚的基督徒宣传，争取他们主动将孩子有偿地献给教会；二是发掘有献身信仰意愿的孩童，说服他们的父母；三是“向基督徒说明培养修生的重要性，请他们向那些勉强可以信任的家庭传达这一信息，如果从中发现某些受到一、两个榜样影响愿意献出孩子的家庭，那教会事业就会蒸蒸日上，剩下的问题就只是学生的筛选了。”<sup>⑩</sup>在修生的筛选上，傅方济确定了如下原则，“鉴于无法一下子找到十全十美的学生，缺点相对少者将入选。他们必须虔诚；……必须顺从；……必须仁爱；……必须自愿；……最后必须对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确定他们至少有从事圣职的最基本能力”<sup>⑪</sup>。

因资金所限，修院最初只招收12个学生，后增至20多人，每个学生每年的培养费用为120法郎。修院的教学内容包括中文、拉丁文和教理讲解。在教学上，刘翰墨强调实用原则。为了方便教理讲解，他亲自用中文编写了《道德和教条神学》（Théologie dogmatique et morale）一书，供不懂拉丁文的学生阅读，还翻译了《耶稣的榜样》（l'Imitation de Jésus-Christ）<sup>⑫</sup>。

虽然受到条件的限制，修院设施简陋，容量较少，师资和书籍缺乏，供养困难，加之外界禁教，压力沉重，风声鹤唳，容易影响修生的情绪，妨碍他们潜心钻研，但是修院的成立确实加快了神职人员的培养速度。十八世纪下半叶，四川华籍神父的人数有了显著增加。据陆南记载，1777年以前，四川有9名华籍神父，分别是苏洪学（Paul Sou）、许埃田（Etienne Su）、曾保禄（Paul Tsen）、谷若望（J. B. Kou）、党怀仁（Antoine Tang）、李安德（André Ly）、徐伯禄（Pierre Tchu）、李路加（Luc Ly）和严多默（Thomas Nien）<sup>⑬</sup>。这9名神父中，除了李安德和党怀仁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培养的外，其他都受派于传信部。1777年以后，这些神父多数离世，

只剩下李路加和严多默。为了增强传教力量,1781年,傅方济在龙溪修院为蒋金华(J. B Tsiang)、朱荣(Augustin Tchao, Auguste Tchou)和杨安德(André Yang)受神品<sup>⑥</sup>。1785年,傅方济又为骆玛弟(Mathias Lo)和文查理(Charles Ouen)受铎。1787(或1788年),龙溪修院因查禁被迫迁至宜宾县横江镇落壤沟<sup>⑦</sup>,但修生的培养工作未有间断,随后几年内傅方济又陆续为唐埃田(Etienne Tang)、童鳌(Simon Tung)、甘玛宝(Matthieu Kan)、刘安多(Antoine Lieou)、王若望(Jean Ouang)和傅若望(Jean Hou,也写作Fou)等修生晋铎。

1793年,冯若望主持四川教务。当时法国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教产被收归国有,资金严重短缺,四川教会的财政骤然紧张。1801年,冯若望致信澳门账房,警告如果无法及时收到经费,“可能导致传教士荒废事业,……导致他们要求教徒多缴纳本不应该缴纳的捐献。”<sup>⑧</sup>尽管如此,冯若望仍坚持推行“教育和培养中国司铎,维持和建立言经学校,付洗异教徒儿童”<sup>⑨</sup>的传教策略。为了维持修院的生存,他临时要求落壤沟一带的基督教家庭每年为每名修生筹集10两银(当时相当于75法郎),徐德新管理的川东较为富庶,每年向修院赠捐150两银。此外修院进行自救,将两块活动场地辟为农田种粮。因此冯若望任内,华籍神父人数仍不断增加。1793年,刘若瑟(Joseph Lieou)和杨本笃(Benoit Yang)受铎;1794年,唐伯辉(Michel Tang)、袁在德(Joseph Yuen)受铎;1796年,马文生(Vincent Ma)、周安德(André Tcheou)和严西满(Simon Nien)受铎;1799年,张玛弟(Mathias Tchang)受铎<sup>⑩</sup>。至1801年(嘉庆六年),四川已有16位华籍神父,约占全国同类人员总数的20%<sup>⑪</sup>。

徐德新管理教务初期,四川的华籍神职人员人数进一步增加。1802至1804年,有4位名修生受铎;至1804年末,教区的华籍神职人员增至20人,分别为蒋金华、杨本笃、朱荣、袁在德、杨安德(André Yang)、唐伯辉、文查理、马文生、骆玛弟、严西满、童鳌、唐光仁(Jean Tang)、甘玛宝、罗廷凯(也作罗恺, Michel Lo)、李路加、刘安多(Antoine Lieou)、刘约瑟(Joseph Lieou)、覃多默(Thomas Tsin)和

两名黄保禄(Paul Ouang)<sup>⑫</sup>。同期在落壤沟修院就读的修生有18至20名之多,“他们品德优良、虔诚,拉丁文阅读能力不错。受铎前,他们必须在传教士的指导下传道一年”<sup>⑬</sup>。由于教务发展迅速,徐德新还计划筹建第二所修院,以保证“每年为两名中国修生受铎”<sup>⑭</sup>。

1805年嘉庆禁教,落壤沟修院曾一度关闭。不过稍后修院不仅得以重开,而且规模进一步扩大。刘翰墨在修院附近购买了几块地皮,扩大修院,加建一所小教堂。由于从修院毕业的司铎和传道员得到基督教家庭的信任,所以申请修道的人数不断增加。1809年,落壤沟修院已招收了20名修生,每人每年的花费增至170两银(未包括粮食的支出)<sup>⑮</sup>。1810年8月1日,徐德新致信总会说:“不断有人提出申请,不算那些尚未见面的,我已经认识了将近30人,他们来自教区的不同地方,大部分人受热诚的驱使而来。他们已经在基督教学校中学习了好几年,期待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我们修道院的一员”<sup>⑯</sup>。由于申请人数增多,修院在修生选择上就更加严格。徐德新将候选人员分组,每组5到6人,带在身边学习几个月,观察他们的性格和潜力,然后再根据修院名额的空缺情况推荐最具潜质者到修院进修。另一方面,1801年,圣若瑟修院选定马来亚的槟榔屿为永久性地址。总修院搬迁后,教学趋于稳定。徐德新获悉消息,遂恢复派员留学,以期培养高级神职人才。1806年、1807年和1808年,四川教会就分别派出4名、2名和4名修生。1808年,应巴黎外方传教会澳门账房雷东达(Letondel)的要求,江马修(Matthieu Kiang)到槟榔屿协助管理圣若瑟修院<sup>⑰</sup>。

在生源有保证和时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四川每年都有华籍神父晋铎。根据徐德新致传信部的信件,1806年有刘廷瑞(Thaddée Lieou Ting-ty)和穆安多(Antoine Mou Tien-siang)晋铎;1807年有江马修(Matthieu Kiang Ku-hoi)、王保禄(Paul Ouang Ta-Kuey)、何若望(Jean Ho Tchong-kien);1808年有何拉法(Raphaël Ho)<sup>⑱</sup>;1810年有刘若望(Jean Lieou Kien-se)和一文(Ouen)姓修生;1811年有劳马克(Marc Leao Yuen-lin)、刘路易(Louis Lieou Tsin-sieou)和徐保禄(Paul Siu Hio-chang);1813年有张伯禄(Pierre Tchang)、李伯禄(Pierre Ly Kien)和刘汉作(也称刘翰佐,

Paul Lieou Han-tcho)<sup>⑦</sup>。1814 年在川传教的华籍神父增加到 25 人,是清代中期人数最多的年份<sup>⑧</sup>。

常明出任川督后,教会受到严重的打击。1812 年底,刘翰墨去世。1813 年 1 月 23 日,徐德新指定助理主教罗神父(Jean-Louis Florens)为修院新院长。1814 年,落壤沟修道院被人告发,清政府予以查封,罗神父逃往交趾,修生四散。为了保存本土化的成果,徐德新令冯达拉(Louis Fontana)接管修院,并在天全县大川坪修建“立书堂”<sup>⑨</sup>。但是不久徐德新被捕,“立书堂”的建设基本处于停顿。1815 年以后,“(落壤沟)修院不再复存,也无法在恶劣的环境中重建,传教士只好让修生跟随他们到处奔波。杨神父(Escodéca)身边有 5 名修生,冯达拉有 4 名。两三个中国司铎也以他们为榜样。为保证传教的质量,杨神父送 3 名修生到西东京,一人病逝,另外两人因嫌麻烦而返回四川。所有的男、女言经学校在一段时期内完全消失。四年间,四川代牧区失去两名主教、12 名华籍司铎、部分教徒、修道院、言经堂、学校”<sup>⑩</sup>。

1817 年 6 月(或 7 月),冯达拉当选四川代牧<sup>⑪</sup>。清道光时期,禁教政策稍有松弛,四川教会重整旗鼓,恢复兴办修院。有迹象显示,冯达拉重修过云南龙溪修院。1830 年(道光十年),传教士罗安白(Laurence-Joseph-Marius Imbert)在宝兴县邓池沟修建“领报堂”,俗称“穆坪修道院”,罗安白出任院长<sup>⑫</sup>。穆坪修院正常运作后,冯达拉才在 1836 年(或 1837)关闭龙溪修院<sup>⑬</sup>。1837 年(道光十七年),川省华籍神父恢复到 23 人,占全国同类人员总数的 27.3%;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增至 31 人,约占全国同类人员总数的 40%,如果加上殉教的朱荣、童鳌、袁再德、刘必约(即刘安多)和罗恺等人,清代中期四川华籍神职人员的数量和比例居全国之最<sup>⑭</sup>。

#### 四、经费资助

除了人员培养外,巴黎外方传教会还向在川活动的华籍神父提供传教经费资助。据陆南述,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年度预算中,远东宗座代牧每人每年的传教经费是 600 法郎,普通传教士 300 法郎;后来主教增加到 1000 法郎,传教士 400 法郎。一般而言,华籍神父是没有经费资助的,

但是四川例外。马青山与穆天尺争夺四川传教权时,“为表明巴黎外方传教会并没有放弃四川教务”,在川的华籍神父每年能够从巴黎外方传教会领取 200 至 300 法郎的传教资助<sup>⑮</sup>,后来还增加到 400 法郎,与外籍传教士持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傅方济后期才发生变化,当时法国大革命爆发,传教会出现财政困难,被迫取消在川华籍神父的资助。在这种情况下,为示公平,不使华籍神父因缺少经费而难以继续传教,傅方济对所有外籍传教士的经费进行重新分配,“传教士平均每年领取 200 法郎的传教经费,其余的献与传教事业”<sup>⑯</sup>。

####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清代中期,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其传统传教地盘四川依据既定的原则,物色和选拔神父人选,通过外派留学和自办修院两个阶段培养华籍神职人员,并为他们的传教活动提供经费资助,此举在四川造就了一大批本土传教骨干。这些华籍神父适应流动性的传教活动,协助外籍传教士管理教区,联系传道员和贞女等基层传教人员,巩固教徒社区的信仰,对清代中期四川天主教会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通过上述关于神职人员的选拔原则、培养原则和培养方式的叙述,笔者认为,作为天主教四川本土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职人员本土化策略实际上是按照天主教义的要求,对神父人选进行“洗脑式”的宗教灌输,然后再通过他们去影响大批下层群众。它始终忽略了天主教乡土化的必要性,所以也为教会的发展留下了诸多隐患。受这些神父影响入教的天主教徒,必然在意识形态上与本土主流文化格格不入,成为社会的“异类”。这就为清代中后期四川剧烈的民教冲突埋下了伏笔。

(责任编辑:东 月)

①④⑤ 罗伯特·安特蒙:《18 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载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8—109,114 页。

② ④⑧ 秦和平:《清代中叶四川天主教传播方式之认识》,《世界宗教研究》,2002 年第 1 期,第 67—78 页。

③ ⑧⑬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A. Launay:《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Se-



- Tchoan》Vol. 2, Paris: Téqui, 1920, appendice 468, appendice 98, 293, 51—52, 42, 40, 8—11, 98, 99, 138, 139—140, 142, 193, 98, 261—262, 267.
- ④ 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J. B. Maigrot,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Eglise de l'Asie), No. 175.
- ⑤ 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Lacerre,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o. 165.
- ⑥ 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Raymond,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o. 204.
- ⑦ 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Pottier,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o. 202.
- ⑨ Notice bibliographique d' Artigues,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 174.
- ⑩ 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Lefebvre,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 190.
- ⑪ 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Pansut,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 255.
- ⑫ 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Boutouillic-Villegonan,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 302.
- ⑬ 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Devaut,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 238.
- ⑭ 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Delphon,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 264.
- 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 J. -M. Sédès: 《Une grande âme sacerdotale: le prêtre chinois André Ly》, Paris: Declée de Brouwer et Cie, 1942, pp. 25, 25—26, 46, 145, 146—147, 44, 144, 145.
- 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 A.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Se-Tchoan》Vol 1, Paris: Téqui, 1920, pp. 486, 487, 222, 470, 469—473, 473, 474, 476—477, 477, 479, 480, 397.
- ㉔A. M. E (Archiv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vol 27, p513. in A.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Se-Tchoan》Vol 1, Paris?: Téqui, 1920, p. 486.
- ㉔L. Guiot: 《La mission du Su-tchuen au XVIII<sup>e</sup>me siècle: vie et apostolat de Mgr. Pottier》, Paris: Téqui, 1892, p. 205.
- ㉔Traduction de lettre du cardinal Barberini aux Vicaires apostoliques. A. M. E vol. 425.
- ㉔J. Guennou: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Paris?: Le sarment Fayard, 1986, p. 78.
- ㉔J. Charbonnier: 《Histoire des chrétiens de Chine》, Paris: Desclée, 1992, p. 191.
- ㉔《Avis sur les missions de Chine》, A. M. E vol. 400, p. 457.
- ㉔《Lettre de Pottier à Descourvière, 25 mai 1788》, A. M. E. vol. 439, p. 13.
- ㉔《Lettre de Pottier à Alary, 6 octobre 1779》, A. M. E. vol. 435, p. 945.
- ㉔《Lettre de Saint-Martin aux dir. du Séminaire des M. E., 9 août 1798》, A. M. E. vol. 439, p. 456.
- ㉔《Lettre de Martiliat, 27 août 1740》, A. M. E. vol. 433, p. 1229.
- ㉔㉔㉔㉔《Journal de Martiliat》, A. M. E. vol. 434, p. 673, 640, 692, 42,
- ㉔㉔André Ly: 《Journal d' André Ly: prêtre chinois, missionnaire et notaire apostolique, 1746—1763》, Hongkong: imprimerie de Nazareth, 1924, p. 81—359, 413,
- ㉔方豪: 《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第 132 页。
- ㉔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Falconet,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 219.
- ㉔Notice bibliographique d' Alary,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 217.
- ㉔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Gleyo,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 218.
- ㉔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Moÿe,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 235.
- ㉔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Saint-Martin,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o. 236.
- ㉔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Dufresse,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o. 246.
- ㉔㉔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Hamel,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 233.
- ㉔《Lettre à Descourvières, 17 octobre 1781》, A. M. E, vol. 447, p. 788.
- ㉔《Lettre à Descourvières, 15 octobre 1778》, A. M. E., vol. 437, p. 842.
- ㉔方豪在《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指修道院在 1782 年迁至落壤沟, 陆南在《四川传教史》也有同样的提法, 但据巴黎外方传教会根据档案重新整理研究结果, 修道院是在 1787 或 1788 年才迁到落壤沟, 详见 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Hamel.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 233.
- ㉔㉔秦和平: 《清代中叶四川官绅士民对天主教认识之认识》, 《宗教学研究》, 1999 年第 1 期, 第 70—77 页。
- ㉔《Papport à la Propagande, 28 octobre 1804》, A. M. E., vol. 1250, p. 1056.
- ㉔《Mgr. Dufresse à MM. Boiret et Langlois, 1<sup>er</sup> août 1810》, A. M. E., vol. 1250, p. 1374.
- ㉔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Fontana,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 323.
- ㉔Notice bibliographique d' Imbert,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 338.
- ㉔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Fontana,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 323.